

## 關中·外緣：第八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研習心得

黃旨彥 美國賓州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博士生

去年十月，我機緣巧合地在美國佛州的中國中古史會議上，結識了焦南峰老師。當時焦老師曾經玩笑般提及做漢唐研究的人，怎麼可以不來西安看看呢？當時心中深以為憾，旋即得知兩岸營即將在西安舉行的消息，暗自下定決心一定要把握這次機會，親自踏上這塊神交已久的土地。在此，特別向主辦單位致意，感謝團隊成員過去一年的辛苦策畫，讓我有機會參加這次營隊，一圓先前的遺憾。

這次營隊以「中心與外緣」為主題，希望促使學員透過課程演講及田野調查從長時段去反思以西安為中心的關中地區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層面上的地位轉變。之所以不武斷地名之為「從中心到邊緣」的轉變，是因為從課程演講、田野調查及綜合討論上，學員都不時被提醒中心與邊緣這一組概念，並不能簡單視之為一個線性的發展，我們反而要去思考「中心」與「外緣」是如何被定義的。在這個層次上，周漢唐所帶來的輝煌歷史記憶如何參與建構關中地區人民的地方認同，並不是本屆兩岸營討論的重心；在我看來，講師與學員都更為看重曾經生活在關中這片土地上的不同人群。在細細剝除罩在周漢唐輝煌歷史記憶上的大一統敘事後，其實我們看見的是奠基於當地族群多樣性的多元文化表現，這毋寧更貼近於關中地區身為核心交通地帶的地理特色。

舉例而言，我們曾經在營期間探訪寧夏彭陽姚河塬商周遺址。姚河塬遺址被認為是西周王朝的大型聚落，但是考古發掘卻發現很多殷商文化的痕跡，姚河塬考古隊隊長馬強老師因而提出這處遺址可能是由被西周裹挾到西北殖民的殷人協助建立的。主持漢景帝陽陵發掘工作的焦南峰老師，在導覽陽陵外藏坑時，分享了最新的檢測成果，指出當時漢景帝的食單上面可能不但有海鮮、也有茶。無論是海鮮還是茶，都不是關中地區傳統的出產品，可見當時南北貿易之發達。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林聖智老師從關中地區的北朝粟特墓葬中，指出粟特人一面接受中原喪葬文化的同時，一面又隱晦地保留了他們族裔拜火信仰的元素。我個人認為這裡有趣的部分並不是「多元」，而是一個「隱」字，粟特人特意挑在石床不引人注目之處擺上拜火教的信仰元素，其動機與背景頗值得進一步探討。北京大學榮新江老師指出兩點發人省思：其一，關中是中國文化的要地，但唐代的關中滿滿是胡味，宮廷內有許多胡人侍衛，長安城內也有許多胡人將領及胡商居住。其二，所謂的「胡味」也並不是一個統一的整體，榮老師指出，單長安一地，就有各式各樣不同風格的胡人聚居。例如同樣拜祆教，波斯人和粟特人所拜的祆廟，可能就會有侍火跟侍祆神這樣不同的側重點。因此，榮老師也認為長安的

胡化和河北的胡化不可輕易一概而論。我們在固原博物館內所見波斯及東羅馬帝國的出土錢幣，以及史訶耽所擁有的一枚刻印有中古波斯文的印章，都從物質文化證明關中地區的文化多樣性。

抱持著這樣的認識，再回頭去看寧夏須彌山圓光寺內的明代碑文，番僧的存在便顯得十足順理成章。閱讀須彌山圓光寺殘留的碑文及題記是很有意思的，番僧與漢僧尋求不同勢力的背書，很可能是寺內權力鬥爭的縮影。我總是在想成化四年的〈圓光碑記〉碑陰將衛所眾人的題名，列於番僧堅敦監參之後，是不是暗示著衛所諸人是番僧勢力的支持者呢？可惜像這樣的猜想，限於個人學力不足，也限於目前所見的史料有限，無法再進一步申述。岐山周公廟內的碑記也十分有意思，我們小組得益於張侃老師及耿勇的一往直前，所以採集到許多碑文。我們小組特別分工去錄碑裡的題名，得到了許多有意思的材料，可以討論以周公廟為核心的信仰與地方社會的關係。首先第一個有意思的問題就是姜嫄信仰的影響力。以姜嫄信仰為核心舉行的廟會及以姜嫄廟做為學子求學的空間，都讓當地識字或不識字的人士在不同程度上對姜嫄信仰產生情感認同，因而屢次支持姜嫄廟的翻修。另一個有意思的問題則是地方社會中佛道雜揉的現象。清末姜嫄廟的翻修不但有名宿、進士、官員、商會、祈子會等不同的地方勢力，也出現了以廟宇為名義的資助。立於民國期間的道人周崇貴碑中，將重修福興寺做為周崇貴的善行之一。所以透過碑文等地方文獻，我們看到的並非判然對立的佛道勢力，而是共存共榮的發展。不同宗教元素的雜揉互動，也是陝西師範大學西部邊疆研究院王欣老師的講題。他以艾蘇哈蔔·凱赫夫麻筍為例，指出新疆地區伊斯蘭化的過程中，如何融合當地原有的佛教及薩滿元素，並創造出獨特的敘事來解釋這種不同文化的元素共存的現象。

關中地區的多元文化表現，可以說是我此行最大的收穫。做為一名漢唐研究者，中古域外交流的頻繁其實是不須多說的常識，但是當研究者用“cosmopolitanism”來概述時，這種文化的包容性及活力似乎只停留在思想與認識的層次。但當我跨出教室及書齋，實際走入博物館、走入墓葬區、走入清真寺，親自看到祆教的圖示及不同語言如何在不同的載體上留存，我才真正感受到域外文化真的是唐人，或說關中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果要具體描述這種感受，就好比說唐長安城的地圖是許多研究者耳熟能詳的，但只有在我親自花了二個半小時從鐘樓一路向南走到了陝師大，我才能體會到唐代長安城規模的弘大，並對漏夜上早朝的官員們產生了強烈的同理心。在開始進行博論研究之前，獲得這種認識的好處是無庸置疑的。在過去我僅從漢人的角度考慮唐人宴會文化，但當這次出行發現出土文物中，保留最多宴會圖象的是粟特人墓葬時，我不得不重新評估宴會文化裡的域外文化影響。若我將來在這個主題上小有所成，那一切的起點必將歸之於此次出行，茲以記之。